

■ 学科史与学科基本理论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25.01.010

微观决策：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范式革新



陈涛,徐晓娟

(西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成都 611130)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系统等宏观层面,较少关注基层组织 and 个体发展等微观层面。当前,中国教育政策研究正在掀起一场从“宏大偏好”向“人学回归”的微观转向研究风潮,促进政策研究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关照的宏(观)微(观)结合,开启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新探索。随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人民性、高质量和精准性成为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价值旨归。按照学科范式标准来理解教育微观决策研究,有必要以知识本位为出发点:一是透析理论之维,通过梳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的逻辑进路,发现这些学科无不在微观层面已具有成熟的理论和实际运用,这对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具有启发和推动作用;二是寻求方法之维,教育微观决策研究集批判主义、量化分析和质性研究于一身,可采取混合式研究策略分析微观现象和问题。教育微观研究之根本就是要面向群众、问计于民,从基层和个体层面回应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的重大关切,推动教育强国和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微观决策;教育政策;政策研究;范式革新;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25)01010711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这一要求不仅彰显教育事业发展的人民性理念,更是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引。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者注意到以往偏重

致谢:论文写作中得到多位师友的关注、支持和启发,他们是北京大学卢晓东教授、兰州大学卢彩晨教授和包水梅教授、苏州大学金国副教授、扬州大学李海龙副教授、重庆文理学院张海生博士、中山大学韩茜博士以及两位外审专家,还有西南财经大学徐迎庆、李菁、巴音姗等研究生对此文亦有重要贡献,在此一并感谢。

修回日期:20240912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四川县域普通高中学生的家庭教育期待及协同育人机制研究”(SCJJ23ND334)

作者简介:陈涛,男,甘肃兰州人,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教育微观决策、青年发展与区域人才政策研究;

徐晓娟,女,湖北恩施人,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

引用格式:陈涛,徐晓娟.微观决策: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范式革新[J].重庆高教研究,2025,13(1):107117.

Citation format:CHEN Tao, XU Xiaojuan. Micro decision making: paradigm innovation in China's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5, 13(1):107117.

“宏大叙事”的研究范式给当前的教育政策研究带来了诸多弊端,因为传统的教育政策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忽略基层组织和教育个体在微观层面的复杂认知、情感体验以及行为方式。显然,这一认识可视为学界对已有教育政策研究的“集体反思”,同时也形成一股呼吁加强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风潮”。为揭示这一“微观转向”的研究动态,本研究希冀建立一条“描绘学术现象—阐释价值特征—构建知识体系”的分析路径,即按照学科范式的标准来分析研究转向的本质特征和进化逻辑^[2],旨在从微观视角切入,发现基层和个体关注的教育议题,以求人们能更深入地理解教育体系中的动态变化及其相应机制,从而提升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精准性、有效性,促进教育强国建设与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关注微观转向: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学术景观

在当下不确定性加剧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教育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和具体化。然而,传统的宏观视角通常侧重于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框架,忽视基层组织和微观个体在教育过程中的需求与体验。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回应微观层面的教育需求及其挑战,教育政策研究亟须引入微观视角。在此背景下,教育政策研究逐渐出现从宏观视角到微观视角的转向,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学界对教育政策研究复杂性的共识,也体现了对教育实践中个体差异和具体情境的关注。

(一)宏观溯源:教育政策研究的“宏大偏好”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具有国家性、地方性和社会性三大宏观指向^[3]。一是教育政策的国家性。即教育政策研究往往围绕国家重点关注的教育问题展开。国家的教育发展目标^[4]、社会需求^[5]、经济发展战略^[6]等均直接影响着教育政策研究的方向与内容,其研究议题通常与国家教育改革^[7]、教育公平^[8]、教育质量提升^[9]等宏观主题密切相关。二是教育政策的地方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我国逐渐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教育体制——从中央向地方分权、从政府向社会渗透。因此,我国教育政策研究体现出对地方教育实践^[10]、教育资源分配^[11]以及教育治理^[12]等地方性特征。三是教育政策的社会性。在教育领域开展多元主体办学、社会合作办学、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等具体实践,形成以国家为主导、地方统筹、社会办教育的模式。教育政策研究倾向于从宏观层面认识和理解民办教育在社会体系中的角色与作用^[13],为民办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科学依据^[14]。

教育政策本身具有宏观特性,因此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历来有偏好“宏大叙事”的传统。2001—201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高等教育类立项课题主要集中于“国家”和“系统”层面,在累计的1363项高等教育研究选题中占比高达86.5%^[15]。然而,近10年来,国家教育科学研究规划的项目选题逐渐倾向于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和公众关心的教育话题。与此同时,过去20年间,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博士学位论文往往偏向于宏观教育系统的研究^[16]。此外,通过对CSSCI期刊《高等教育研究》1980—2019年发表的3886篇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宏观研究论文的比例为68%,而关于教师和学生等微观层面的研究仅占32%。对比之下,SSCI期刊*Higher Education*在同一时期发表的论文中,宏观研究为972篇(占比31%),微观研究则有2194篇(占比69%)^[17]。这一显著差异揭示了我国教育研究的宏观政策偏好,也暗含着一种“宏大叙事”式的研究范式和路径。

总体来看,我国教育政策研究深受国家发展规划和“政府逻辑”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宏大叙事”模式和偏好,对微观层面的关注相对不足^[18]。与“宏大叙事”相比,微观视角的核心在于“人”,而这一关键维度的忽视,导致“人学空场”出现,这一现象可能带来以下弊端:一是教育政策研究在追求宏观理论的构建时容易缺失“人”的主体性。教育政策研究之所以表现出主要为宏观战略服务,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看,已有教育政策研究更加关注宏观的外部关系规律,忽视

微观的内部关系规律^[19],即忽视对“人”的规律的研究。二是从宏观角度出发的教育政策研究强调“抽象人”而非“具体人”,容易忽视地方和个体差异。宏观政策研究通常着眼于政策的顶层设计和整体框架。但在实际过程中,由于地方、学校、家庭乃至个体具有很大的差异,仅从宏观角度出发难以完全满足微观个体的要求。三是长期关注宏观层面可能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从宏观角度出发的政策可能缺乏对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教育政策研究容易与教育实践的具体情况脱节。因此,为了克服这些弊端,教育政策研究需要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重视地方、学校、家庭乃至个体层面的具体需求和实践反馈。

(二)微观转向:教育政策研究的“人学回归”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单一视角的宏观研究往往具有“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局限性,使得研究结果变得空洞,甚至会导致道德、情感、价值和审美的退化。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其著作《人性论》中表示,人类的科学知识是构建其他学科坚实基础的关键^[20]。无论教育政策研究所涉及的议题多么复杂、广泛,其根本目的都是关注人的成长与发展。教育政策研究应以人的需求和潜能为出发点,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微观转向不仅涵盖对个体和小群体等主体关注点的扩展,还体现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微观化的转变。显然,微观视角带来的矫正与超越,为教育政策研究增添了深度和广度,使得研究更切合实际,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首先,教育政策研究越来越重视弱势群体。教育政策研究的微观转向通过关注边缘化群体,展现每个生命独特的成长轨迹,表达弱势群体的心声,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秩序。其次,教育政策研究越来越重视个体生命的成长与发展。个体生命历程不仅受自身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文化、家庭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从个体心理和社会等角度出发,微观转向为研究不同群体成长与发展历程提供了分析框架和解释视角^[21]。最后,教育政策研究的关注点逐渐微观化。相较于宏大的政策体制或者精英人物的教育思想,教育政策研究关注微小的内容,揭示决策背后的动机和个体行为的复杂性,认识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规律,从而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教育问题。例如,教育选择是每个受教育者都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当前在家庭教育选择行为^[22]中出现的择校^[23]、择教^[24]、择学^[25]、择业^[26]等问题引发了学界的关注,这些教育选择行为深受中国家庭文化价值观及教育观念^[27]的影响。除学校教育之外,家庭教育的特征也值得关注。不同的家庭呈现不同的教养方式,例如中产阶级家庭教育受精英主义的影响^[28],而底层家庭独特育人行为则显示底层文化资本^[29]的特点。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双重影响下,教育主体的自我意识^[30]、家庭教育期望^[31]等都是对当下教育现实的写照和反馈,当今社会境况下的教育个体充满了复杂的情感,更加关注人的情感体验^[32],譬如支持^[33]、抑郁^[34]、焦虑^[35]等,让人民满意就要关注当下民众的教育情感需求,这对于教育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价都有重要意义。

(三)宏微结合:顶层设计和基层关照的有效互动

顶层设计和基层关照分别代表了教育政策研究中的宏观与微观视角。顶层设计是从国家战略和整体规划出发的宏观政策与框架,而基层关照是对个体和群体在具体教育实践中需求与体验的理解。这两者虽然关注的对象和层次不同,却相辅相成,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教育政策的有效落地。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所言:“个人困扰也是公共议题。”^[36]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就是要从个人看到公共,同样在公共之下看到每一个人。

教育政策研究本身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特点,呈现一种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模式,而教育政策的微观视角研究则体现了基础性和具体性特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基层关照逻辑。顶层设计与基层关照的互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顶层设计具有导向作用。顶层设计作为国家教育政策的总体规划,确定了教育发展的方向、目标和基本路径。通过引导教育体系的整体发展,顶层设计为基层关照对国家

教育资源进行整合与合理配置。二是基层关照具有实践反馈作用。基层关照是顶层设计在实际操作中的落实与反馈。在基层关照中,通过对具体教育问题的细致观察和深入分析,发现并解决政策在实际执行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对地方教育实践、学生个体需求等微观因素的关注,基层关照为顶层设计提供实践经验与反馈,促使政策更加贴近实际,更加灵活、有效。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关注教育政策研究的微观转向,并非对宏观研究“非此即彼”式的理解。事实上,教育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是一种互动式关系,即宏观、微观两种视角在不同层面对“人”的关注,由于视角不同,所关注的“人”的实质也不同。教育宏观研究关注的是一种“抽象人”,即对现实生活中的具象个体的泛化、抽象化和概念化。相较之下,教育微观研究则聚焦于教育过程中的“具体人”。法国教育家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曾强调教育应当关注个体的具体性和独特性。这种观点提醒我们,如果仅仅追求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方式,最终只能做一些“普遍适用”但又可有可无的理论指导,无法真正关注那些具体的、鲜活的人,也就无法深入教育的真实场景。因此,教育政策研究应当基于对微观需求和生活场景的深入理解,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抽象的、普遍适用的理论^[37],这样才有助于其实施能更好地满足特定群体或个体的特殊需求。

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价值特征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必须牢牢把握人民性的价值追求、高质量的目标要求和精准性的实践需求。这不仅是对当前教育政策和实践的深入反思和改进,更是人民对教育需求的真切回应。关注不同群体的现状与需求,动态调整教育供给,制定差异化政策,有效提升教育公平和质量,努力实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根本目标。

(一)人民性的价值追求

教育微观决策研究是基于微观的视角,深入学校、社区、家庭等基层组织和个体所处的具体情境,发现和分析各种教育现象及问题困惑,并将其纳入教育政策研究的范畴,揭示教育需求与供给中的实际问题,制定能真实反映民情民意的教育政策,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

从教育需求角度看,不同群体的教育需求也在与时俱进,感知教育需求的变化,问计于民,才能制定符合实际需要的教育政策。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诉求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满足人民群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转变,为教育政策的动态调整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民众的教育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群体受多种因素影响,其教育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只有通过微观视角,才能真正识别和理解这些需求的差异性,识别不同群体的独特需求。从教育供给层面看,教育供给侧的动态调整需要确保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进行精准对接,使教育系统能够及时响应社会需求变化。教育供给必须通过调整招生规模、学校数量和师资配置,确保教育资源能够满足社会对不同层次教育的需求。通过微观视角进行感知并合理调整教育规模,可以有效避免教育资源的短缺。行业 and 产业结构的变革影响了人才结构的变化,教育供给侧需要根据这些变化优化教育结构,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有助于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二)高质量的目标要求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第五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以“教育强国”为核心议题,强调了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性,指出在教育强国战略当中,基础教育是基点,高等教育是龙头^[38]。教育的高质量不仅意味着教育系统的全面提升,还包括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的有机结合^[39],其核心在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其中,基础教育是教育体系的基点,代表着公共教育服务的基础性和均衡性,确保所有学生在相同起点上接受优质教育。高等教育则是教育体系的龙头,通过培养拔尖人才和推动创新,起到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是通过系统性改革和创新,提

升基础教育的均衡性和高等教育的综合质量,最终实现教育公平与优质的双重目标。

作为基点的基础教育核心是均衡性和基础性。均衡性指向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确保所有学生都能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教育均衡不仅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前提,也是教育质量提升的基础。基础性体现了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根基作用,是学生知识和能力培养的起点。基础教育的质量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未来的发展潜力,因此必须提供高质量的教学内容和服务,确保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龙头的高等教育核心是创新性和引领性。创新性强调高等教育在培养人才、推动科研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关键作用。高校需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和研究方向,以适应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培养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引领性体现了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高等教育不仅要培养高层次人才,还要通过引领科技和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现了一个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也是国家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精准性的实践需求

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意义在于满足精准性的实践需求,在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各个环节中都发挥重要作用,不仅确保政策制定更加精准,还保障政策的有效执行和精确评估,为推动教育系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基础。

在政策制定层面,教育微观决策研究能够提供微观数据和调研结果,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教育系统中不同群体和地区的具体需求。传统的宏观政策制定往往基于整体趋势和统计数据,但这些数据可能忽略了地方性和群体性差异。微观研究通过对基层教育现状的详细分析,使政策制定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政策执行层面,教育微观决策研究有助于政策的精确落地。通过对具体需求进行深入研究,教育微观决策研究能够为政策执行提供详细的指导,有助于政策措施符合实际情况。在政策评估方面,教育微观决策研究提供了精细化的工具和方法,能够深入探讨政策实施后的实际效果。微观研究通过对基层教育实践精细化的跟踪和分析,能够评估政策在不同层面上的执行效果,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政策调整和优化,提升教育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适切性。

三、多学科的解释: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理论维度

长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直存在“宏微之辩”。为了帮助人们深入了解基层、群体乃至个体的行为方式,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多个人文社会科学,无不在探索人类经济社会中的“微观世界”。随着这些学科的研究认知展现出系统的微观特征,教育研究特别是在教育微观决策研究方面也受到微观视角的启发。教育政策研究的关注点逐渐从宏观的政策制定与结构分析,转向更加具体的、细致的个体行为和小群体互动研究,以期能揭示教育微观主体与社会结构的互动规律。

(一)微观经济学:“经济人”假设与教育主体的理性选择

传统上,经济学被划分为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领域。相较于研究整体经济现象的宏观经济学,微观视角的经济学是从经济活动的“原子”出发来研究微观主体的经济选择。在经典著作《国富论》中,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人们往往倾向于利用其资本以最大化地产出价值^[40]。经济学主要研究微观个体、家庭与企业如何进行经济选择,以及他们在市场中的交易行为^[41]。因此,微观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把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当作“经济人”来分析。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理性因素被剥离在外,理性被视为人类行为的核心特质。

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微观经济学有3个特征:在研究对象方面,微观经济的决策主体是单纯的抽象人。在理想情况下,决策者拥有所有信息并做出最优选择。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无法总是做出最优决策,而是寻求一种满意而非最优的有限选择。在研究内容方面,微观经济学的重点在于研究如何有效地分配资源,其核心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利用有限资源,生产出最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

品^[42]。在研究方法方面,微观经济学主要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经济活动所涉及的数据提供了丰富的量化基础,使得经济学能够用科学的手段来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并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从教育领域来看,教育微观决策研究首先要认清研究对象,即不能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视为抽象的、孤立的个体,而是将其置于整体的教育现象之中。相较于微观经济学将人进行抽象,教育微观研究承认人的具体性。只有通过分析个体的需求、偏好、能力和决策过程,才能更好地理解教育活动中的复杂互动。其次,在倡导教育公平时也应同样关注效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效率的重要性逐渐凸显,而当前的教育政策决策总是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即兼顾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最后,为了更加客观地理解教育现象与教育问题,需要收集和分析大量数据,支持基于证据的科学决策。教育研究需要更加注重实证和数据驱动的分析,强调研究方法的具体性与结果的可重复性。

(二) 微观政治学:“人民社会”与教育政治行为取向

一般而言,传统政治学倾向于从宏观角度研究“权力”,通常将其与国家机构和法律联系起来。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解构主义和其他后现代微观政治理论对这种宏观视角提出了质疑^[43]。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强调,权力不仅存在于国家的宏观层面,还遍布社会的各个层面,甚至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44]。在这种研究视角下,权力不再被看作国家机器,而是像毛细血管一样深入人们的行为、态度和言语之中,影响着日常生活,构成了一种与宏观政治结构相对应的“微观权力结构”。就我国而言,“人民”是政治生活中的特殊概念,“人民社会”是中国社会相对于西方“公民社会”的创新性发展,“人民社会”是共建、共享的社会,因而更具优越性,其建设方法是不断改善民生,社会治理方法是坚持走群众路线^[45]。

微观政治学强调深入社会微观层面,其有三大特征:在研究视角上,微观政治学关注日常生活实践,聚焦于社会微观层面的政治研究,反对整体性、去中心化和多样性,强调个体行动者的自主行为和决策能力^[46]。在研究对象上,相比于关注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机制,微观政治所关注的是那些毛细血管式的现代微观权力形式及其政治效应。如在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格局中,福柯关注边缘性问题的政治观是专注于微观权力的经验证明。在研究方法上,微观政治学在无法进行大规模实验时重视案例研究和田野调查。这些方法有助于深入理解特定背景下的政治现象,以及个体或小群体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的决策过程。

微观政治学对教育微观决策研究有以下三大启示:第一,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关注权力结构及利益博弈。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往往涉及不同利益群体的互动,政府、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等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协商过程、利益平衡都影响着政策的最终形态和效果。第二,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关注个体和群体的权力分配。在学校场域中,权力的分配涉及资源和机会的平等分配;在家庭场域中,母亲在家庭内部的角色反映出家庭的权力关系同样是一种微观政治^[47]。第三,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强调教育决策应达到善治良治之效。从微观政治学看教育政策则有助于理解地方教育治理中的操作和博弈过程,保障政策在不同地方和学校得到有效落实。

(三) 微观社会学:“行动者”导向与教育社会情景关联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股以行动者为导向的研究力量试图撬动传统的“宏大”社会学范式。它们从“微观”角度出发,对个人的动机、追求等进行分析,以此来研究和解释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化。在微观社会学研究中,符号互动论、拟剧论、社会建构论、情感社会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多个理论流派无不从“行动者”导向的方法、路径进行探索和应用,其共通之处在于关注个体的生活经验、日常生活和社会行为,旨在揭示特定的社会结构如何在人们的日常活动和生活领域形成并发挥作用,理解结构网络、资源场域和关系网络^[48]。

微观社会学的“行动者”导向有两个特征:从研究视角而言,“微观”范式的主张者无不强调“微

观”与“宏观”之间的联系。譬如,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努力通过互动仪式链理论,将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统一起来,并提出微观现象是基础,宏观过程是由微观过程构成的,是互动式社会学研究的基点,也是揭秘宏大社会变迁的起点^[49]。就概念理解而言,不同学者赋予“行动者”的内涵和解释各有特点。如吉登斯(Giddens)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agency),以此理解行动者获取知识的能力以及克服生活困境的应对能力,这是一种文化建构^[50]。布迪厄(Bourdieu)通过引入场域、资本和惯习等概念,形成社会行动理论的基本线索。其中,惯习解释了行动者如何使用他们的资本,而场域则明确了资本作用力的具体范围^[51]¹²。总之,微观社会学更加强调通过“特有概念”赋予行动者的社会内涵和行动方法,并且努力建立微观情境与宏观模式的“链条关系”。

如果将微观社会学的“行动者”理论纳入教育领域,不难发现它更加符合教育微观决策的理论需求。第一,具有“行动者”导向的特有概念有助于解释教育微观决策。在教育日常中,作为教育行动者的教育正是基于其“能动性”拥有获取知识的能力和采取行动的能力。在教育社会学领域,教育常常被等同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资本拥有量又直接反映在场域(家庭和学校)之中。这些场域中的行动者是有意识、有思想和精神属性的人,因此有什么样的教育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个体惯习——决策倾向系统^[51]³³。第二,教育微观决策是由个人所形成的教育社会网络和社会关联。正如著名社会理论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的,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并非一种理论,而是一种观察社会生活宏微关系的方法^[52]。就此而言,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就是要通过分析教育行动者的微观情境,突出行动者的教育与社会网络关系,洞察教育意义的建构并上升到教育宏观政策层面。

(四)微观历史学:“民众史观”与教育日常结构互联

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微观史学,由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和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等人倡导,成为一种创新的研究路径。这种方法的特点是“聚焦细节,执行微观层面的深入分析,并且对文献进行彻底的探索”^[53],通过详尽地描述个别个体或小规模事件,揭示其深层的文化意涵和价值,从而反映出特定社会环境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近年来,在中国历史学家如王笛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微观史学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应用。微观史学就是通过“为民众写史”的史学观和“深描”的手法,把重点从对社会的全面考察集中到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的考察,着重关注民众眼中的日常生活。

微观史学凸显“为民众写史”的历史观,它有3个特征:一是在选取研究主题时,微观史学专注于历史上的特定个人或集体,深入挖掘他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所隐含的文化驱动因素。正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所提出的,历史学者通过刻画个人生活、事件或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展现历史的文化和景象^[54]。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微观史学主要采用提名法和推测法。通过对个体的精确识别和定位,将研究焦点缩小至具体的个人^[55],这种研究方法不是依赖可复制和量化的观察模式,而是侧重于对看似孤立无援的细节进行综合解读^[56]。三是在叙述方式上,微观历史学常采用生动的文学化叙述,以小见大地进行分析。这种叙述风格使复杂的历史问题更易被公众理解,增强读者对历史的兴趣。

在微观史学研究范式的启发下,教育微观决策就是要破除宏大叙事带来的弊端,使“人”得以回归与复魅。第一,教育微观决策的研究对象是要从精英人物的教育理念中走出来并关注教育场域中的“普通人”。无论是从纵向研究还是从横向研究,教育微观决策应该关注父母与子女、教师与学生等这些“具体人”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第二,教育微观决策在研究方法上适合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因其对个体、情境和细节的深入关注,能够捕捉、分析复杂的教育现象中的细微差别和个体体验,提供丰富的、情感化的资料。第三,教育微观决策在关注视角上强调倾听微观主体的声音。要深入了解个体教育经历,发现那些在宏观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具体问题,从而制定出更有效的教育政策。

四、混合式策略: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鉴于教育微观决策的多学科特质,有必要采用“混合式”方法论策略。这些策略不仅有助于从不同角度理解教育现象与问题,更能在具体实践中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指导,通过恰当方法的运用,探索隐藏在教育制度和政策背后的微观问题现象,深入了解个体和群体的真实经验和感受,有助于促进方法论策略在教育微观决策研究中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分析与解释。

(一)采用批判主义的研究视角

批判理论研究是在马克思社会批判学说上发展起来的,不论是思想层面还是学科领域,批判都是推动人类精神进步的核心动力,在知识积累和智力提升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反观教育领域,批判理论研究以独特的方式把教育与政治权力、社会文化等结合起来,并对其关系进行剖析,为教育微观决策研究方法提供理论基础和范式指导^[57]。

首先,教育微观决策中的批判主义方法有助于揭示隐藏的不平等现象。通过对教育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出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在教育机会和结果上的差异,并关注这些差异背后的结构性原因。批判主义研究方法不仅提供教育不平等问题的实证依据,也为制定更加公平的教育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其次,教育微观决策中的自下而上的批判主义方法有助于推动教育政策和实践的正当性、公平性。批判主义研究方法的核心在于将弱势群体纳入公共政策范畴,重新审视和调整教育政策,这有助于揭示和理解现行政策的不足,推动教育系统向更加公平和包容的方向发展。最后,教育微观决策中的批判主义方法强调人民性的价值取向。教育微观决策的研究对象通常是那些在主流教育研究中被忽视或被边缘化的群体,如贫困家庭学生、随迁子女、留守儿童以及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等。通过批判主义范式的研究,能够呈现这些弱势群体的真实声音,揭示他们在教育过程中所面临的独特挑战和困境。

(二)利用微观数据的量化分析

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实证研究方法逐渐成为教育研究的重要工具。教育定量研究是以实证主义为基础,依据数据资料检验理论假设,揭示教育现象中各种因素相关关系的研究范式。作为一种强调科学和客观性的研究范式,实证主义通过系统观察、测量和数据分析来研究教育现象,为教育政策和实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首先,微观数据能够捕捉到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教育表现。教育微观决策所涉及的个体背景是多样化的,需要对各种复杂的教育行为进行解释,这种基于数据的分析有助于揭示不同群体在教育决策中的差异和共性。其次,微观数据分析可以通过数据追踪个体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这对于理解教育政策的长期效果和趋势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大型微观数据在教育政策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如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提供了丰富的微观数据,涵盖了家庭经济状况、教育支出、子女教育表现等多方面的信息。最后,微观数据分析有助于提高教育政策决策的精准性。教育政策的制定需要基于精确的数据,微观数据分析有助于提供更精确的证据支持,使政策更加符合实际需要。

(三)倾听底层声音的质性研究

质性研究往往通过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来深入理解行为和意义构建过程,其宗旨是探究社会现象、解读深层含义,展现全面和深层的社会文化架构^[58]。在教育研究中,质性研究的应用强调对教育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究,以揭示教育的内在意义和过程。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由于其微观特性,需要对群体或个体进行深度挖掘和剖析,因而与质性研究方法有天然的适配性。

首先,深度访谈法在教育微观决策研究中的应用极为广泛且具有独特优势。这一方法不仅能够

获取详尽的个体决策过程和内在动机,还能通过受访者的叙述揭示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对决策的影响。开放的提问方式促使受访者详细描述其决策过程、考虑因素和情感体验,能够深入理解个体决策过程,捕捉到教育决策背后的复杂社会和文化背景。其次,以自我民族志为主的叙事研究主要是以收集和分析个人或群体故事的形式,关注个体经验,突出个体对社会文化的反身性理解。在教育微观决策研究中,自我民族志关注自我及其与他者的关系,突出教育中以人为本的微观研究视角,关注教育情感和体验,挖掘教育主体的个体价值。此外,教育微观决策研究不是单纯地对教育现象进行描述,还在此基础上探明个体或群体行为背后的教育语境和教育意义。最后,以自传社会学、田野调查、民族志等研究自我为方法,着眼于自我的多重性,反思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重塑立体性的自我。将自我置于研究的核心,重视个体的体验,并强调在文化社会现象下对个体进行理解,有助于弥补文化研究中可能忽略个体的缺陷^[59]。在教育微观决策研究中,这类方法提示教育研究要在关注教育主体的个人价值的基础上,将视角放到整体的教育背景中,揭示个体行为背后的深层含义。

五、结 语

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并非要取代宏观政策研究,也并非站在一个极端去批判宏观政策研究,而是要将微观视角——“具体人”纳入教育宏观政策视野之中。这不同于以往对“人”进行抽象化和模糊化的理解,而是将“人民”“民众”“群众”等唯物史观概念进行鲜活化和具象化处理。换言之,政策研究者、决策者应该走出传统的精英式研究思维和模式,深入群众之中,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扎实落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目标,让民众有真正的教育获得感、认同感和幸福感。这种微观视角正是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价值基础。然而,从学科范式标准来看,亟须构建教育微观决策研究的知识体系,但无论是来自多学科视角的理论之维,还是面向混合式策略的方法之维,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都应该有理有据有法地支持和加强微观层面的研究。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微观决策必须置于宏观社会之中才具有效力,否则教育微观决策会陷入“自以为是”的状态。也就是说,教育微观决策需要在认识社会的基础上理解教育问题,这是教育微观决策研究每一个核心议题的前提。因此,教育微观决策需要关注当下中国的教育问题,譬如将“家庭”纳入教育政策中,关注不同微观群体的早期经历和个体经验,以更好地理解其面临的生存现状和教育环境。当前,在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征程中,要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形成教育政策研究的宏微关联。显然,如何建立这一关联,以及如何开展教育微观决策研究将是我们后续研究的重点内容。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221026(01).
- [2] 李均.“知识本位”抑或“制度逻辑”:高等教育学建立标志辨析[J]. 高等教育研究,2023,44(5):3746.
- [3] 孙霄兵. 70年中国教育政策演变的基本路线和宏观模式[EB/OL]. (20191108)[20240906].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4904839.
- [4] CHENG T J, LI X X. Sociology of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review and prospects (20122022)[J]. ECNU review of education,2024,7(3):655676.
- [5] 冯建军. 优质均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新目标[J]. 教育发展研究,2011,31(6):15.
- [6] 郭庆旺,贾俊雪. 公共教育政策、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溢价[J]. 经济研究,2009,44(10):2235.
- [7] 杨银付. 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从《教育规划纲要》看国家教育改革发展方向[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11(2):4450.
- [8] 赵心慧,李志明.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重要论述的四重逻辑[J]. 教育研究,2024,45(7):417.
- [9] 覃创,潘芳. 新时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演变与发展向度[J]. 教育评论,2023(4):2833.

- [10] 黎勇. 政策文本视域中我国农村学前教育质量观念的表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政策文本为考察对象[J]. 学前教育研究,2023(8):3946.
- [11] 袁振国. 缩小差距:中国教育政策的重大命题[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515.
- [12] 张万朋,张瑛. 从公平走向充足:新时期我国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目标转向与提升[J]. 教育发展研究,2022,42(24):816.
- [13] 李爱香. 基于社会需求的民办高校教育管理模式创新[J]. 教育与职业,2016(12):3637.
- [14] 徐巧云,楼世洲.“应然”抑或“实然”:我国民办教育政策研究的主题分析与理性反思[J]. 教育与职业,2022(3):7784.
- [15] 杨柳青,李祖超. 2012—202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项目立项统计分析[J]. 高教发展与评估,2021,37(6):14-23,119-120.
- [16] 罗丹. 近二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21:99-102.
- [17] 李均,周奕. 论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模式”[J]. 高等教育研究,2020(3):6+67
- [18] 刘小强. 寻找高等教育学的“另一半”:建设微观高等教育学刍议[J]. 江苏高教,2012(3):24-27.
- [19] 潘懋元,肖海涛.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结构与体系变革[J]. 高等教育研究,2008(5):2631.
- [20] 大卫·休谟. 人性论[M]. 贾广来,译.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3.
- [21] 李琳璐. 精英大学“小镇做题家”的生存状态与行动逻辑[J]. 重庆高教研究,2024,12(4):113-127.
- [22] 徐晓新,张秀兰. 将家庭视角纳入公共政策:基于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演进的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16(6):154-169,207.
- [23] 文东茅. 我国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及其对弱势群体的影响[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2):1223,189.
- [24] 鲍威. 第一代农村大学生的升学选择[J]. 教育学术月刊,2013(1):311.
- [25] 谭敏. 他者的力量与教育选择:基于农村留守儿童生命历程的个案研究[J]. 少年儿童研究,2023(6):4452,14.
- [26] 徐兰,刘慧,易照琼. 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和实践策略[J]. 成人教育,2024,44(3):6673.
- [27] 薛海平,张又文. 家庭文化价值观对中小学生家庭选择影子教育的影响研究[J]. 北京青年研究,2024,33(3):6578.
- [28] 姚远,张帆,程诚. 优绩主义的代价:家庭成就观如何影响青年互联网公益参与[J]. 中国青年研究,2024(7):4856.
- [29] 谢爱磊.“读书无用”还是“读书无望”:对农村底层居民教育观念的再认识[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15(3):92-108,190.
- [30] 玄铮. 何以困于长衫:大学生职业角色冲突的归因分析[J]. 中国青年研究,2024(4):105-112.
- [31] 储招杨. 县中学生父母教育期望与教育选择的现状和生成逻辑[J]. 少年儿童研究,2024(4):512.
- [32] 夏当英,李静. 技术二重性:数字时代“空巢青年”的情感体验与主体解困[J]. 中国青年研究,2024(7):3847.
- [33] 陈涛,鞠沁汝,李点石. 纽带与桎梏:家庭情感支持与第一代大学生学习投入的激励路径——基于“大学生心声调查项目”的实证分析[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24(4):4960.
- [34] 程猛,李嘉怡. 象牙塔尖的忧郁:博士生抑郁体验的叙事研究[J]. 教育研究,2022,43(7):88-103.
- [35] 巩阅瑄,陈涛,薛海平. 爱的边界:家庭教育焦虑是否会增加课外补习投入?[J]. 教育发展研究,2021,41(Z2):82-92.
- [36]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 陈强,张永强,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8.
- [37] 保罗·朗格朗. 终身教育引论[M]. 周南照,陈树清,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8788.
- [38] 管培俊,刘伟,王希勤,等.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笔谈)[J]. 中国高教研究,2023(7):+8.
- [39] 满忠坤. 教育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的“三重意识”与逻辑进路审思[J]. 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3,6(1):3-15.
- [40] 亚丹·斯密. 国富论:上卷[M]. 郭大力,王亚南,译. 南京:中华书局,1936:27.
- [41] 金碚. 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兼议经济学中国学派研究[J]. 管理世界,2019,35(2):723.
- [42] 张恒龙. 论“经济人”假说在微观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J]. 经济评论,2002(2):74-74.
- [43] 李素艳. 从宏观政治转向微观政治:解构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维度[J]. 理论探讨,2009(4):74-74.
- [44] 米歇尔·福柯. 权力的眼睛:福柯思想访谈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9.
- [45] 王绍光. 社会建设的方向:“公民社会”还是人民社会?[J]. 开放时代,2014(6):2648,5.
- [46] 欧阳谦. 福柯的新政治观:一种微观权力的谱系学建构[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26(2):5764.

- [47] 卡梅隆·林·麦克唐纳. 影子母亲[M]. 杨可,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21.
- [48] 肖冬平,梁臣. 社会网络研究的理论模式综述[J]. 广西社会科学,2003(12):166168.
- [49] 兰德尔·柯林斯. 互动仪式链[M]. 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1.
- [50]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M]. 李猛,李康,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7.
- [51]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李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52] 布鲁诺·拉图尔. 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M]. 刘文旋,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25.
- [53] GIOVANNI L, On micro history: new perspective historical writing[M]. Philadelph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1:99.
- [54] 劳伦斯·斯通. 历史叙述的复兴[G]//陈垣,耿相新,译. 新史学:第4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25.
- [55] 李均,黄丹阳. 高等教育微观研究的实质与范式[J]. 大学教育科学,2023(2):413.
- [56] 王笛.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M]. 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8087.
- [57] 王兆琛. 我国教育研究中的四种范式及其批判[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158163.
- [58] 陈向明. 质性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9.
- [59] 蒋逸民. 自我民族志:质性研究方法的新探索[J]. 浙江社会科学,2011(4):1418,155.

(责任编辑:杨慷慨 校对:蔡宗模)

Micro Decision Making: Paradigm Innovation in China's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CHEN Tao, XU Xiaoju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China's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has mainly focused on the macro level such as institutions and systems, but less on the micro level such as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China's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is starting a micro-turn research trend from "grand preference" to "anthropological return", promoting policy research to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macro and micro of top-level design and grass-roots care, and carrying out a new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micro-decision-making research. With the concept of "providing education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people" taking root in people's hearts, the values of people-orientation, high-quality and accuracy have become the ultimate values of educational micro-decision-making research.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on micro-decision-making in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disciplinary paradigm,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knowledge-based posi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firstly, to analyze the dimension of theory, by clarifying the logical progression of many disciplines, such as economics,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se disciplines have mature theori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t the micro level,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nspiring and promoting role in the research on micro-decision-making in education; secondly, it is to seek the dimension of methodology, and the educational micro-decision-making research integrates criticism,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adopting a mixed research strategy to analyze micro-phenomena and problems. The root of micro-education research is to face the public and ask for the people's advice, to respond to the major concerns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macro-policy at the grassroots and individual levels, and to promote a strong n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Key words: micro-decision-making; educational policy; policy research; paradigm innovation; knowledge system